

成都大学文明互鉴与“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学术丛书总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互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是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是维护世界和平与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而“一带一路”则是文明互鉴的重要路线、渠道和阵地。尤其是在时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在多元文化碰撞、交流日益密切的时代语境下,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促成各国文明、文化的交流、互鉴、共存,以消除不同文明圈之间的隔阂、误解、偏见,对于推动国家整体对外交往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创新,建构“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全球性文明,乃至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成都是一座具有4500年文明史、2300多年建城史的城市,是中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着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创造过丰富灿烂的文明成就,形成了“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天府文化精神。成都又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从古蜀时代开始,就形成了文化交流、互鉴的优良传统,留下了文明互鉴、互通的千古佳话。作为“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南方丝绸之路”起点城市,成都在新时代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互鉴与“一带一路”倡议中占有重要地位,扮演着重要角色,必当乘势而上、大有作为。

成都大学是一所年轻而又古老的学校,其校名可追溯到1926年以张澜先生为首任校

长的“国立成都大学”。虽然1931年后即并入国立四川大学,但却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不仅居四川三大学(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大、公立四川大学)之首,而且在全国教育部备案的21所国立大学中,也名列第七。并且先后有吴虞、吴芳吉、李劫人、卢前、伍非百、龚道耕、赵少咸、蒙文通、魏时珍、周太玄等著名教授在此任教。因此,成都大学乃是一所人文底蕴深厚、以文科特色见长的高校。即便从通常所认为的1978年建校算起,也仍然产生了白敦仁、钟树梁、谢宇衡、常崇宣、曾永成“五老”,并且都是以传统的文史学科见长的教授。成都大学作为成都市属唯一的全日制本科院校,理应成为成都文明互鉴、对外交往、文化建设以及提升国际化水平的重镇和高地。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成都大学在实施“五四一”发展战略,实现其高水平快速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如何接续其深厚人文传统,再现文科历史荣光,建成成都文化传承发展创新高地,在成都世界文化名城及“三城三都”建设中,擘画成大方案、提供成大智慧、贡献成大力量,就成了成大人的光荣使命和重大责任,因此,加强与兄弟院校的合作,特别是依托四川大学的高水平学术平台、师资、项目,借智借力、培育人才,建设学科,积累成果,不断发展壮大成都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就成了不二选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都大学进一步强化拓展与四川大学的合作,在其“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下成立“成都大学文明互鉴与‘一带一路’研究分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中心”以中华多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为基础,旨在为促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多元文化对话、互鉴及未来的创新发展而搭建支撑平台、凝聚社会共识、建立情感纽带,引导引领成都大学文科高水平和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中心”立足西南、心系天下,充分发挥成都作为“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南方丝绸之路”起点城市的独特优势,以学术研究为依托,以理论研究、平台构建、学科培育、人才培养、智库建设为抓手,积极参与构建当代中国国家文化,就文明互鉴、“一带一路”倡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创新作出实质性的贡献。要实现上述目标,需要搞好顶层设计,精心编制中长期规划,汇聚和培育一支高水平人才队伍,立足成都大学人文社科的现实基础和优势,久久为功,集腋成裘,推出一批高水平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充分彰显学术创新能力,逐渐提高“中心”的影响力。因此,编撰出版“成都大学文明互鉴与‘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学术丛书”成了重点工作和当务之急。

“成都大学文明互鉴与‘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学术丛书”每年从成都大学人文社科教

师专著中遴选,并全额资助出版。每年一辑,一辑8种左右(以当年申请且通过中心学术委员会评审者而定)。开始几辑不分学科系列,待出版的专著积累到一定数量或每年申请资助出版专著数目较多时,方按学科类别分为几个系列。如天府文化系列丛书、成都大学学术文库、重点优势学科研究系列丛书(如古典学、文艺学、比较文学等)。资助出版的著作作为专著、译著、古籍整理(点校、注疏、选注等),以创新性、学术性、影响力为入选标准。力求通过10年的持续努力,出版80部左右学术著作,使“丛书”在学界产生较大的规模效应和影响力,成为展示成都悠久厚重历史文化积淀、中国社会科学西部重镇丰硕成果的“窗口”和成都大学深厚人文传统、雄厚社科实力和丰硕“大文科”建设成就的一张靓丽名片。合抱之木,起于茎寸。百年成大,再铸辉煌!但愿学界同仁都来爱护“丛书”这株新苗,在大家精心浇灌壅培下,使之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 □杨玉华

(作者系成都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成都大学文明互鉴与“一带一路”研究分中心主任、学术委员会主席、文新学院教授,四川大学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文新学院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四川四省社联常务理事、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



从天府文化到文明互鉴

中华文明作为唯一现存的四大古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由不同地域、异彩纷呈的古文化组成,其中许多古文化依旧以一种现代化的形式流传于当代生活中。蜀文化,或曰“天府文化”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我们常说的“巴山蜀水”“乐不思蜀”“得陇望蜀”等成语,早已暗含了中国人民对天府文化的喜爱与赞美。20世纪30年代初,四川广汉月亮湾遗址的考古发现,揭开了古蜀文明研究的序幕;而自2020年秋以来,广汉三星堆遗址新一轮6个祭祀坑的大规模考古发掘,使古蜀历史文化成为社会与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目前,通过长时间系统深入研究,学界已构建了一个较为普遍认可的古蜀文明发展与变迁链条,即营盘山文化→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晚期蜀文化→秦汉巴蜀地域文化。然而,“天府文化”在当今学界仍显得模糊,缺乏一个系统性的当代化的建构。迄今为止,还没有以《成都文化史》或《天府文化史》为题的著作问世。这无论在学术研究界,还是在地域文化的挖掘与利用上,都是一个缺憾。

成都大学杨玉华教授携团队编写而成的《成都大学文明互鉴与“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学术丛书(第一辑)》的出版,特别是其中《天府文化概论》的问世,填补了这一空白。编写团队历时两年,第一次系统性地对“天府文化”的概念、范围进行了界定与建构。该书作为四川省社科基金课题重要研究成果,围绕天府文化的古今变迁,涵盖了地理、历史、艺术、科技、宗教、人文等全面、多样的文化领域,对天府文化做到了充分的挖掘,可以说博览古今、罕见洽闻,在学术意义与实用价值上达到了兼具。这是这本书的重要贡献。

在世界多元文化、不同文明交相辉映的今天,我们也越来越意识到,文明的交流和互鉴才是文明史的历史主流。重写文明史是当今学者的一大时代课题,也是关切人类文明的一大课题,不同文明语境、不同学科类都有难以计数的问题等待我们去挖掘、清理、解剖。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文明、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书写不应寥寥几笔,中华文明观也不应该在甚嚣尘上的冲突论、终结论中噤声,那些长期被忽视的、被歪曲的、被贬低的史实是时候在历史的回流中把握住言说的际遇,拨乱反正,澄明自身。“重写文明史”便是一次主动发声的际遇。中国学者借此言说自身的文明观,书写自身的文明史,由此延伸到各个学科史,从文明这个根子上来突破,从各个学科来入手,建构文明新话语,献策于当下百变的文明治理格局。

在重写文明史的语境下,《天府文化概论》开了一个好头。这是因为,充分挖掘自身文化、建立自身的学术话语,立足于对本文明的深入全面的知识体系的理解,是进入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基石,也为重写文明史提供了一手资料。其实,很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古老精神一直传承到了当代,只是没有进行系统的建构与整理,以至于没有被国际所知。譬如,巴蜀文化的开放精神。逢山必须开道,遇水必须造桥,古蜀先民为了突破封闭,在发明了栈道的同时,又发明了笮桥。笮桥即绳桥,有多种类型,至今尚可见到的藏区的溜索和编网的藤

桥,峨山上的竹索桥,滇西北的编网篾桥,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桥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铁索桥,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智慧体现。从古蜀文明开放的精神,延续到现今的“一带一路”战略,这是一种文化地理学上的传承,也是理应被世界人民认识到的。

再如,古蜀文明作为古代中国文明的艺术成就的地位。三星堆青铜器的“立体雕塑”特征,在与之同时期的世界范围内,也是十分突出的。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大家只认识到同时期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其雕塑十分发达,风格以写实为主;但却忽略了,三星堆青铜雕塑与之相比,毫不逊色,而且抽象化特征更为明显。四川博物院副研究员郭军涛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曾经在意大利古罗马时期的建筑中举办过一个展览,罗马时期雕塑与三星堆青铜雕塑同时陈列,三星堆青铜雕塑一点也不输于前者,极具视觉冲击力。”2019年以来启动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发掘,古蜀文明再度引起轰动,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其所代表的制作技术、艺术审美都是独一无二。当我们习惯了文明必谈希腊罗马,却忽视了中华文明自己的特点与优势,就会造成文化上的“失语”,进而导致文明史的扭曲。所以,将这些原有的古文明的“世界性”确立起来,特别是我们进行文明互鉴的很重要的一步。

文化自信、文明互鉴需要正本清源。正如书中所言,“天府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4500年文明史的积淀中产生的。它拥有荡气回肠的历史、刻骨铭心的事件和载入史册的人物,凝聚着“天府之国”的经济、历史、社会、政治、人文、地理、交流等各方面的传承与发展。我们把这些整理下来,正本清源,是传承与发扬中华文明的一个必要的工作。与此同时,四川大学还启动了“创新2035”先导计划,其中重要一项就是“文明互鉴与全球治理研究计划”。该计划聚焦人类文明多样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巴蜀文化与文明传承、全球语境中的儒释道等领域,旨在通过加强世界不同文明间的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可以看到,厘清中华文化的优秀部分,将其放在全球化、现代化语境下进行系统梳理,既有促进学术发展之旨意,也具有顺应历史潮流的现实意义。我想,在这一趋势下,《天府文化概论》的出版将提供一份极有价值的参考文献。最后,在“天府文化”概念的进一步探索上,还可以加入学界同仁的集思广益,使之更加细化、精深。

成都大学文明互鉴与“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作为四川大学“协同创新中心”的分中心之一,在成都大学的大力支持和杨玉华教授有力领导下,虽成立不到两年,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成为几个分中心中的“领跑者”,“丛书”(第一辑)的出版就是最好的证明。数千里者必积跬步,汇涓流者终成江海。本辑丛书的出版,既是对成都大学文明互鉴与“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两年工作的一次小结,也是保障后续研究深入推进的良好开端。相信在广大读者、学界师友鼓励、帮助、鞭策下,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丛书”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成都大学文明互鉴与“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也将兴旺发达、蒸蒸日上! □曹顺庆

(作者系欧洲科学史与艺术史学院、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四川大学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四川大学文新学院学术院长)

探寻天府文化根脉

《成都大学文明互鉴与“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学术丛书(第一辑)》已于近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本辑丛书共收录成都大学人文社科领域优秀学者的最新研究论著7种,250余万字,煌煌典册,蔚为壮观。

成都大学文明互鉴与“一带一路”研究中心自2021年5月成立以来,寒暑易节,春秋两度,相关工作扎实推进,成效显著。如今,经过管理、研究、编辑、出版工作者长期辛勤耕耘、通力合作,代表中心在文化研究、文明互鉴、学科建设方面最新进展的系列学术丛书终于面世。作为充分彰显中心学术创新力的精品力作,本次联袂推出的7种学术论著体现出几方面的鲜明特点。

第一个显著特点是深耕精研地方文史,聚焦天府文化、成都城市文化的梳理挖掘。成都是一座具有4500年文明史、2300多年建城史的城市,是“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和“南方丝绸之路”起点城市。开放、包容、交流、互鉴是这座城市的文化传统。在新时代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互鉴与“一带一路”倡议中,成都作为重要基地,理应成为“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的3部论著之一。《天府文化概论》《唐诗疑难》《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日据时期韩国汉语会话书词类研究》《阿恩海姆早期美学思想研究》4部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由树立本土文化自信,到推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再到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清晰逻辑主线。

唐诗是中国文学艺术桂冠上的明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瑰宝。一千多年来,探索、研究、疏释唐诗者踵武不绝,取得了可观成果。但是,历代唐诗研究中一些聚讼纷纭的疑谜,至今仍未得到完全解决。张天健、张起父子的《唐诗疑难详解》便是一部关注唐诗研究领域众说纷纭而又未能解决之疑难问题的专题论著。该书带着问题意识,综合运用注释、笺证、考订、品藻、述事、论说、圈点等研治唐诗的传统方法,广采博收,融通古今,汇考证、调查、搜奇、品鉴、佚文于一体,对唐诗中的悬疑进行探索、揭秘、破译、存疑,将学术性、知识性、实用性汇于一炉,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如果说《唐诗疑难详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寻根溯源,那么车南林的《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就是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能力的一次全新探索。该书呈现出两大亮点:第一,坚持“学术利国利民”的原则,切实结合国家“下大力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这一大背景,为中国广电媒体从事国际传播实践进行了有益探索,为强化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参考性的思路。第二,结构完整、内容丰富、数据详实、案例清晰,为中国广电理论研究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除此之外,本辑丛书中张程的《日据时期韩国汉语会话书词类研究》和李

天鹏的《阿恩海姆早期美学思想研究》两部论著则进一步涉及了中国文化与东方世界、西方世界在文学、美学领域的对话。其中,《日据时期韩国汉语会话书词类研究》以《汉语会话书——1910—30年代旧活字本9种》为研究对象,从文献考订、语言研究、体例及内容三个方面对中韩两国汉语会话书进行考察。其主要创新点在于:一,语料齐全,不再是选择汉语会话书中的一两本作为研究对象。二,全面描写,在每一章节中对每一个词类都进行穷尽式地分析。三,内容丰富,不仅针对某一个或几个词类,而是努力描写了大多数的语言现象。《阿恩海姆早期美学思想研究》一书则是目前国内对阿恩海姆早期美学思想展开系统研究的唯一专著。该书对阿恩海姆早期的美学特征进行了呈现。其主体内容有两大亮点:一,具有整体性视野,从“纯形式的简化”“多元的感知”“格式塔作者”“媒介帝国主义”“直觉与完形的早期认知美学”等角度,全面地梳理了阿恩海姆早期美学思想及其特征。二,并未停留在阿恩海姆早期美学思想的发生语境,而是从早期的语境出发回应了时代学术问题,以前沿性的问题对阿恩海姆早期美学思想展开了当代美学问题的对话。总的来看,这应当是一部值得国内外美学、艺术等学科领域学者参考阅读的书籍。

第三个显著特点是重视学科交叉,以融合创新推动研究工作走向切实深入。融合、渗透、交流、创新是体现科学综合性发展趋势,催生交叉学科,推动学术研究不断前进的不竭动力。当前,学科交叉已经逐渐成为科技创新的源泉,成为科学时代一个不可替代的研究范式。在本辑学术丛书中,我们也能深切感受到强烈的学科交叉意识。这一点在两个层面有所体现。

就整体层面而言,我们眼前的这一套丛书,本身就非常注重学科融合,强调对不同学科领域、内容对象、研究方法、信息、技能,是充分开展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成果。举此一例,可概其余。由此我们也期待不同专业领域、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爱好者都能在本系列丛书中发现自己熟悉的、感兴趣的內容,能从编者、作者们学科交叉、融合创新的努力中获得启发。 □周翔宇

(作者系成都大学文新学院博士、副教授)



Literature&Arts

锦水

08
成都日报



2023年5月9日
星期二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